

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

Globalization and

decline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附译：布迪厄《遏止野火》

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

河 清 •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0/72✓
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

1181 3✓
Globalization and decline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附译：布迪厄《遏止野火》

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

河 清 •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河清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朗朗书房·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

ISBN 7-300-05017-4/G·1018

I .全…

II .河…

III .国际化—研究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7659 号



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

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附译:布迪厄《遏止野火》

河清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62515351(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5 × 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5.625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65 000

定 价 14.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引 言

去年旅欧在巴黎的书店,发现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两本小册子《遏止野火》(*Contre - feux*),副标题为“抵抗新自由主义侵略之言论”。书名原意是为控制森林火灾蔓延而点燃的隔离性火障,直译可作“反火”。我译为“遏止野火”,似更达意。这两本小东西收集了布迪厄近年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演讲稿,文章都不长。与布氏其他大部头著作相比,《遏止野火》有话直说,率真明了,而主要思想和学术关怀,尽在其中。

布迪厄书中所论,与目前中国知识界的情形非常有关。布氏直书“遏止野火”,“抵抗新自由主义侵略”,并非虚张之词。新自由主义思潮最近20年,确实像“野火”一样在世界各地蔓延。欧洲北美,几成燎原之势。除了少数微弱异议之声,新自由主义势不可挡地确立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

与美国学界声息相应的中国学界,当然也把“野火”播燃到中国。一些缺少批评意识和怀疑精神的头脑,只知不加甄别地“转播”西方,尤其是美国传来的“先进”声音。先是福山宣告“历史的终结”,从此进入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普世凯旋的时代。继而有各种“热”:哈耶克“真正的个人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一度构成热门话题,其《通向奴役之路》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被广为论说,学人皆知。柏林的“消极自由”一时间被热烈地讨论,酣畅尽兴。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也引起论者们的一片景仰,肃然起敬。还有吉登斯(A. Giddens)、诺齐克(R. Nozick)、弗里德曼(M. Friedman)等名字,也在中国知识界的明星排行榜上气象不凡。理所当然,有一批中国学者自豪地给自己加封了一个“新自由主义派”的称号。

所谓新自由主义之“新”,是相对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而言,其实两者一脉相承。如果说欧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某种质疑,那么新自由主义今日的得势,可谓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某

种清算。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可谓某种集体主义,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计划经济)。而新自由主义则崇尚个人主义,否定国家干预经济的功能,主张放任由市场来调节,让经济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有学者将新自由主义归纳为“个人至上”和“市场至上”。因此,新自由主义直接否定具有社会民主性质的“福利国家”,削弱国家救助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功能。

初识布迪厄的形象,是在一部题为“知识分子的世纪”的法国系列电视资料片当中。印象中,布迪厄有一种以萨特为榜样的使命感,充满为人民疾苦奔走呼号的精神。他组织编写的厚厚的一本《世界的贫困》(*La Misere du Monde*),表露出他深刻关注社会的情怀。法国有人悲叹,当今法国的知识分子已丧失“传统”的社会批判精神。而布迪厄可谓这个“传统”的最后一位代表,其后尚不见有分量的来者。

布迪厄那样的学者,很可能被一些人贴上一个“左派”标签,然后不屑一顾,因为如今是左派溃不成军、丧失合法性的时代。但我以为,对西方思想家不应究其属于左派或右派,而应看其思想是否有道理。左派的激进性、空想性和乌托邦,无疑要反省批判。我曾毫不含糊地批判过左派祖师爷卢梭(参阅拙著《民主的乌托邦》),追究过“卢梭之错”。但这不妨碍我在法国“左派”布迪厄和美国“左派”乔姆斯基(N. Chomsky)的思想中看到正确的见解。我对法国“右派”学者雷蒙·阿隆颇为欣赏,也并不妨碍我对“右倾”的新自由主义的质疑。

人们不应以“左派”、“右派”的表面标签来给人定性。西方知识界的当红明星吉登斯,尽管提出了《超越左与右》,鼓吹《第三条道路》,把自己绑在偏“左”的英国工党的马车上,但他繁杂、折中和矛盾的理论却透露出他并没有“超越”什么(除了在“话语”上),也没有清晰画出“第三条道路”究竟是什么。吉登斯之“路”倒是与偏“右”的新自由主义多有重合,“形左而实右”。布迪厄对这位耍语言花腔的高手没有看花眼,将其归入新自由主义之流。

朋友江弱水曾在香港学习生活多年,对西方世界多有深刻见解。一次我们聚谈,谈及中国“精英”们对西方“主流话语”的迷信。江兄喟

然叹曰：“这些人就像《水浒传》中黄泥冈上喝了蒙汗药酒的杨志和军汉，西方智多星们相顾庆幸道：‘倒也！倒也！’”

中国众多的政治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只知顺从西方舆论媒体的有意宣传，尤其是出于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世界主义情结，认定“全球化”是世界潮流，是历史必然规律。中了西方智多星们的“奸计”却浑然不知，一往情深地拥抱“全球化”。何止是“倒也”，简直是糊涂得不可救药。

布迪厄的《遏止野火》清醒地揭示：“全球化”口号本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人为宣传，而新自由主义是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全球化”是跨国公司摧毁各民族国家经济主权乃至政治主权，在经济上控制全球的战略口号。布氏反复强调：“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种有预谋、有组织实施的“政治行为”，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灌输工作”在人们心目中强加的信仰。“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宣传的产物。

人们都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营生是收集情报，是为美国政府、为美国大财团大公司忠实效力的工具。一旦危及美国大财团的利益，它可以毫不手软地暗杀一个外国总统（如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甚至剪除美国总统（电影《J. F. 肯尼迪》的说法令人信服）。但布迪厄揭露：中央情报局也可以很文雅地长期资助一家法国杂志《证据》（*Preuve*），让其鼓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读书》杂志（2002.5）登载王绍光《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的文章，披露中情局出巨资介入文化艺术领域，实际上是美国的“文化部”，旨在“在外国培养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

美国商会联合会（AMCHAM）看上去应是处理具体商务的机构，但它也十分卖力地搞宣传：“1998年就出版了10本著作和60多篇报告。”（见《遏止野火》）索罗斯是国际金融投机大亨，但他也想到建立一个“开放基金”，拨出资金到东欧和苏联去“推动开放社会”^①。还有众

① 里伯特·斯雷特著：《索罗斯旋风》，244页，海南出版社，1998。

多美国私人基金会,都曾以资金和“民主”书籍,帮助波兰团结工会瓦解波兰体制。

西方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们从不忽视宣传,从来都是通过自己掌握的庞大媒体网络,向全世界播送为其利益服务的舆论,实施一种强大的宣传攻势。

西方媒体并不像一些人想像的那么自由。几家媒体巨头垄断了世界舆论:“两家美国和两家欧洲的传媒机构,控制了全球范围的新闻采集和播送。”^①这几家媒体巨头背后,都有跨国财团和金融寡头“看不见的手”。尤其,如波兰前总统瓦文萨抱怨:犹太人势力控制了世界主流媒体。在美国舆论中举足轻重的《纽约时报》,就是被苏兹伯格(Sulzberger)犹太家族连续几代所控有。^②

犹太人对世界主流媒体的影响,本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历史上,“在任何地方,犹太人都是商业自由最热烈的辩护人”。^③犹太人由于长期流徙,没有自己的国家,曾深受纳粹(“国族社会主义”)的迫害,也是“世界主义”最热烈的辩护人。因此,西方主流媒体对“国族主义”的深恶痛绝,全力清剿,同时长年不懈地宣传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口号,自然就不足为怪了。

①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46页,新华出版社,1998。拥有《时代》杂志、CNN、HBO电视台等传媒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媒体公司。法国也有Matra-Hachette、Alcatel等工业集团,主宰媒体。

② 许知远:《纳斯达克的一代》,5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这位《纽约时报》的老板毫不掩饰他对该报舆论导向的控制:“如果晚上我在家,发现某些我不喜欢的东西将于明天见报,我将毫不犹豫地打电话给编辑部说:‘给我拿掉这些东西!’”见Edwin Diamond: *Behind the Times*, p. 234, New York, Villard Books, 1993。

③ 路易·鲁吉埃:《民主的玄虚——其起源及其幻觉》,见拙著《民主的乌托邦》,380页,香港明报出版社,1994。还可参阅鲁吉埃的另一段话:“在18世纪的法国,犹太人垄断了几乎整个东方的贸易。但作为汇票交易方面无可争议的行家,犹太人尤其控制了钱的交易,组织信贷,发明了期货交易,进行股票投机。犹太人对于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证券市场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最后又把华尔街变成国家金融的仲裁中心。……这样把商品证券化而调动资本,大大放任了证券投机,取消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关系,使经济交易免除了所有道德和法律的障碍,以致其惟一的目的就是赢利:表现为股息或利润。谁都没有像犹太人那样促成了这个宣言:物质利益高于人类任何其他目的;谁都没有像犹太人那样促成播散了这个心态:一切都可以用钱来估价和买卖,哪怕是精神财富。”(同上书,381页)。这个心态,也在今天的中国毫无文化抵抗地播散。

我曾两度去法国学习、生活逾10年,对法国社会和西方文化有身感体受的了解。同时,我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尤其对老家农村的关注。我的生命和文化之根,深深扎在中国,扎在中国农村。我有理由说,我比许多中国“精英”更了解西方,也比他们更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

当我看到众多国内“精英”深受世界主义之惑,跟着西方宣传机器鼓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自由竞争”、“市场万能”等,最终实际上是危害国族利益,我感到深深的悲哀。中国将断送在一批无知、亲美的“精英”手里。

布迪厄的《遏止野火》,挑明“全球化”口号是一种宣传的产物,对于只知口诵“历史规律”、“世界潮流”教条的世界主义迷狂者,可谓一剂珍贵的解药。

当时买了书,就想尽快将其译成中文。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压在我心头:不把此书翻译出来,将有愧于江东父老。尤其那篇《新自由主义——一种(正在实现的)无限剥削之乌托邦》,1998年3月我在巴黎买的《外交世界报》上曾经读到过,当时就有翻译的冲动。无奈,生活中总有那么多挥之不去的杂事,尤其布氏文笔繁复,各种插入语堆成好几行甚至半页,翻译难度很大,所以进展极慢。

针对中国眼下的“灾情”,我只是在两本书中挑选了一些文章来译,大约各取了一半。如果大章小篇通通翻译,会把一些最重要的内容湮没掉,读起来常常如航行在茫茫大海。而精选一部分译出,可以更明晰地突出布氏的思想亮点。

拙文《明目清神,以观天下》,是为浙江大学“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写,集中地表达了我的主要观点,这里作为第一章。

翻译的过程,也让我生出无尽的感慨和联想。当年严复翻译《天演论》,译文中插了许多评语,曰“复按”云云。我也不想只做一个简单的翻译者,而想和严公那样作“按语”。但要作的按语太多,插在译文中会打断文章的文气,故专门拎出来,自由发挥,作为第二章。还有一些思考和建议,作为结论的第三章。

对于布迪厄的观点,读者可以见仁见智。我本人也不是全部赞同

他的观点。比如,布迪厄的揭露文字,真实而发人深省。而他的一些建议,则常常失之空泛,不那么有现实可行性。也许,面对如此强大的跨国公司的力量和遮天蔽日的“野火”,他自己也感受到深深的无奈,只能是“绝望地乐观”。

不管怎么说,读读布迪厄的文章,可以让我们变得清醒一些。如果本书能解去国人一些“全球化”蒙汗药酒的药力,那对我将是一种莫大的欣慰,也可以让我少一点绝望,多一点乐观。

当我尚在写本书第二章时,惊闻布迪厄在 2002 年 1 月 23 日辞世,终年 71 岁。法国各主要报纸都在头条报道了此消息。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总理若斯潘都发表讲话,以示悼念。布氏曾去韩国、日本作过演讲,尚未来过中国这个新自由主义“野火”焰势凶猛的地方。而今哲人长逝,惟愿我这本小书和他的《遏止野火》之中译本能补偿一些他未能来中国的缺憾。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明目清神,以观天下	(1)
1. “芝麻换西瓜”	(1)
2.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宣传	(4)
3. “世界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	(12)
第二章 世界主义,误国殃民	(21)
1. 不可多说一句话	(21)
2. 国将不国	(27)
3. 世界主义之伪	(28)
4. 知识分子的“同谋”	(31)
5. “安居乐业”指数	(33)
6. 警察功能的国家	(38)
7. “野蛮资本主义”的复辟	(41)
8. “理论经济学”骗人	(47)
9. 出让国家主权的“精英”	(47)
10. 两种世界主义	(54)
11. 媒体的文化影响力	(56)
12. 真正意义的“文化革命”	(59)
13. 发财致富者进天堂	(62)
14. 致富的“天职”和“使命”	(65)
15. 从“社会安全”到“风险社会”	(69)
16. “新经济”的泡沫	(71)
17. “文化处于危险中”	(73)
18. 美国经济文化模式的“全球化”	(76)

19. 教育作为“商品和赢利资源”	(77)
20. “保护国族文化的特殊性”	(79)
21. “政商合一”	(81)
22. “合而治之”	(82)
23. “宇达公司现象”	(84)
24. “双重标准”	(87)
25. “膀子换衬衫”	(90)

第三章 文化“正名”,重振自信 (94)

1. 时间思维与空间思维	(95)
2. “易有三义”,变与不变	(98)
3. 诵习经典与文化传承	(100)

附译:布迪厄《遏止野火》 (103)

1. 致读者	(103)
2. 国家的“左手”和“右手”	(103)
3. 打着或借着理性的权力滥用	(108)
4. “全球化”的神话与社会意义的欧洲国家	(109)
5. 泰特梅叶思想	(119)
6. 电视、新闻和政治	(123)
7. 再论电视	(128)
8. 新自由主义——一种(正在实现的)无限剥削之乌托邦 ...	(132)
9. 《遏止野火》续集序	(138)
10. 美国模式的强行及其影响	(141)
11. 强者们看不见的手	(144)
12. 沙粒	(151)
13. 文化处于危险中	(152)
14. 合而治之	(160)

第一章 明目清神,以观天下

当今之世,正处于一个神话盛行的时代。有的来自西方媒体和知识界的宣传,也有的出自中土学人的自我臆想和浪漫夸张。尤其近20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对各种“宏大”、虚华的口号,有着一挥之不去的偏好情结。稍隔一段时间,就又会有人出来宣告:“人类正进入……崭新时代。”当初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欧洲几乎不大听说,但在中国可是掀起一股席卷全国的“信息时代”降临说的狂潮。之后又有“知识经济”、“全球化”、“新经济”等口号。新口号上口之时,人人心神飞扬,飘飘然忘乎所以。

这些华而不实的口号,固然令人亢奋鼓舞,但更经常地是令国人目迷神昏,看不清口号后面的真实世界经济文化状况。

本文试图对“新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文明”(“普世文明”)三个概念的神话性,作一简要的评析。

1.“芝麻换西瓜”

去年初,一年一度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以“新经济”为主要论题。对这个论坛,亨廷顿有一段非常精到的描写:千余名与会者几乎都拥有高学位,“英语娴熟得体,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处理繁多的国际事务,经常出国旅行。他们一般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具有共同的信仰,这也是西方文明里人所共有的信仰。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国际的政府,以及大量世界经济和军事的潜能”^①。可见,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所以中国不仅有代表参加,而且中央电视台连续报道,并以“新经济”为议题

^①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S.P. Huntington: *Le Choc des Civilisations*, Editions Odile Jacob, p.58, Paris, 1997.)

直播谈话节目。

所谓“新经济”，印象中是指基于“高科技”信息技术的产业经济，尤指“网络经济”。因长期习惯于现代主义“新之崇拜”^①思维，国人喜“新”厌“旧”、以“新”汰“旧”、以“现代”取代“传统”已成为思维定式。于是，与“新经济”相对，电视主持人自然就向嘉宾问起了“旧经济”。逻辑上，既然有了“新经济”，那么所有以往的经济形式都成了“旧经济”，或被称为“传统经济”。在人类刚刚进入的这个“崭新时代”，当然是“新经济”的天下，“旧经济”必遭历史淘汰。在电视镜头前，那些个网络弄潮儿个个显得神采焕发，大谈网络增值方式是“六倍于”传统增值方式。而那些“旧经济”的代表，如长虹集团的老总们，则被一个“旧”字弄得讷讷然一脸难色，只是凭常识辩解“传统”经济依然重要。

这个被人们奉作神圣的“新经济”到底“新”在什么地方？人们只需凭常识就会发现，“新经济”其实质并不新：它不过是十几年前闹哄哄过的“信息时代”、后来的“知识经济”等名词的又一种“新”说法而已。只不过原先计算机没有那么“网络”化，现在有了网络，但归根到底还是“信息经济”，或如当红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电子经济”。

但是，正如笔者很早就指出，“信息时代”并不根本地超越“工业时代”。就是说，它并不像“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工业革命”那样是一个“崭新时代”，并不是有了“信息”，现存的“工业文明”就过时了。因为“信息技术”主要关涉服务业（第三产业），本身并不生产什么，不能替代具体的工业物质生产。所以，“信息经济”、“电子经济”、“知识经济”、“新经济”等等，仍然属于“工业文明”，只是其内部开辟的又一领域。

笔者作如是论旨在说明：我们不应该眼睛仅仅盯在基于信息技术的“新经济”上面，而应该同时关注其他所谓“旧经济”——其实远不过时的技术产业：如美国的飞机制造、航天、军工产业，法国的航空、高速火车，德国的汽车制造、机械、化工，日本的电子产业等。当然，被称为“新经济”的这一块，确实是一个产生暴利的领域（因为垄断技术，进而

① “新之崇拜”是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点。参见拙著《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垄断价格和市场,导致垄断利润),我们确实要努力追赶进取,但切莫以为我们搞了“新经济”,便与人家平起平坐了。构成西方科技工业整体优势,并给西方带来巨大贸易优势的,不只是“新经济”一块,而是更多地靠了上述其他产业。

而我们这些年来,似乎有独重“信息技术”,忽视其他产业技术之嫌。比如,我们放弃了发展自己的民用航空工业。据可靠信息来源,早在20多年前,我国就研制出四架中型飞机(可载近百乘客),并成功试航西藏。但由于人为原因,没有继续开发下去,以致今日,我国只是进口民用客机,并且将进口客机当做外交上的“筹码”:在美国“波音”或欧洲“空中客车”之间买你的不买他的。而西方客机是天价:一架中型“空中客车”要5000万美元,一架大型“波音”则要1亿多美元!1997年,中国和法国双边贸易,法国出口中国的最大宗商品是24架“空中客车”,一下就进账12亿多美元,而中国出口法国的服装、鞋帽、箱包、玩具、塑料制品、家具及纺织纱线等前十项最大宗商品,加起来才10亿美元。^①

这就是我所说的“芝麻换西瓜”的世界不平等交换关系。西方科技发达国家传布“比较优势”理论,将一些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品制造业和一些有污染的工业,“分配”给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让它们专门种“芝麻”或“绿豆”,或直接提供原料和自然资源,而“发达”国家自己则专门种“西瓜”。买一个“西瓜”,需要多少“芝麻”、“绿豆”来换?

我们一些经济学家也崇尚“比较优势”论,提倡“出口导向战略”,自甘为人家种“芝麻”、“绿豆”,换人家的“西瓜”,真可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放弃发展自己的民用航空工业,是最典型的“丢西瓜”案例。再如,中国的小汽车制造工业,也可谓放弃了自主研发:是让人家到自己的地里来种西瓜。还有多少“西瓜”我们只满足于进口而没有积极想办法自己种呢?

我们注重的“新经济”,确实是一个大西瓜。但纳斯达克指数的坠落,明确无误地标示了其中的泡沫。另外,“微软”、“英特尔”这样的

^① 见《国际经贸消息》,1998-09-23。

超级跨国公司已经建立了全球垄断。这种垄断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下去,要打官司分割“微软”。要挑战这样的垄断,给这个大西瓜切下一块,已变得非常不易。我们搞“新经济”,仿佛只是美国硅谷技术和产品的大进口商。软件技术,我们甚至还比不上近邻印度。

我以为,应该尽量自己种西瓜,替代进口。只有像当年国家集中优势科技力量搞攻关(“两弹一星”)那样,才能有所作为。自己种西瓜,可以使我国的工业技术结构更完整,促使我国工业技术整体地提高和优化。尽管目前出口“芝麻”、“绿豆”也能赚不少钱,能去换“西瓜”。但要看到,这使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依存度增加(达30%以上),更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威胁。另外,“芝麻”型产品,大多是资源消耗型和廉价劳动力型,不是永久之计。明智的做法,应是调整“芝麻”出口战略,转到努力发展自己的西瓜,完善国内市场。中国这么大地域,完全可以形成像欧盟那样的区域经济区。

我在十几年前曾指出:“……应当全力开拓和完善‘国内大循环市场’。一旦国际市场有不测(普遍衰退或贸易保护),以中国的幅员和人口,中国经济依然可以在国内市场形成良性循环。全抛一片心地投入‘国际大循环’,很可能有一天走向经济崩溃。”^① 亚洲金融危机除了国际金融投机的原因,也暴露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问题,“小龙”变成了“龙虫”,在相当程度上验证了我的警言。

2.“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宣传

“全球化”现在已成了人人挂在嘴边的一个说词,也是一个令多少国人亢奋的口号。有人激动地呼唤“拥抱全球化”,认为:“经济全球化像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人类进入了崭新的全球化时代。”^② 还有:“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成为时代潮流,汹涌澎湃,不可阻挡。”^③ 这样的论点举不胜举,都把“全球化”当成一个“时代潮流”或

① 见拙著《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451页。

② 韩保江:《全球化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③ 李转良:《全球经济一体化》,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历史规律”。

然而,对“全球化”现象大可作一番冷静的分析。“全球化”究竟是哪些东西全球化了?进而可以追问,“全球化”一说最近20年在西方媒体和理论界,接着在中国突然火起来,并非空穴来风,究竟有什么背景?

一般说来,“全球化”是指经济全球一体化,指全球范围内经济贸易交流日益紧密。这大体上是不错的。但是专门郑重其事发明这个词用以描述这样一个经济现象,似乎有些空泛。因为,这样一种经济“全球化”现象,15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就已有描绘。还有人甚至把这种经济“全球化”现象推得更久远。可以说,经贸交流全球化并非最近20年突然出现的现象。相反,在最近这些年,世界各地经济“区域化”现象倒多有显现,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欧洲国家经济交流的70%,是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的”^①,“欧洲联盟生产的全部商品中只有不到10%的商品出口到非欧盟地区”^②。所以,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比较泛泛而论的说法。

事实上,真正可谓全球化的,首先是金融资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随着现代通讯信息技术的提高,电脑互联网络的普及,货币虚拟化成为一种“电子货币”(吉登斯语),呈现为电脑中的数字。由此,全球金融资本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流动性。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钱,每天都有天文数字的巨额资本在流转:“每天全球货币市场的营业额远不止1万亿美元。”这1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如果用100美元纸币擦起来,“将超过120英里,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20倍”^③。

这种全球范围的金融交易额,远远超过全球实物商品的贸易额。后者不过是前者的零头。“1997年全球平均每天外汇交易额估计为1.5万亿美元,其中用于国际贸易不足2%。”^④国际贸易的增长,远远不如国际金融交易总额的增长。“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总额

① 见布迪厄《遏止野火》,本书115页。

② G.博克斯贝格、H.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Die 10 Globalisierungs Lügen),5页,新华出版社,2000。

③ 吉登斯:《失控的世界》(Runaway World),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④ 房宁等:《全球化阴影之下的中国之路》,2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平均以每年 23% 的惊人速度增长”^①,造成西方国家的虚拟资本急速膨胀。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新著《遏止野火》,专门批驳像森林野火那样蔓延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神话。布迪厄认为,“全球化”惟一真实的地方,就是随着世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或“非调控化”(deregulation)和通讯费用的降低,形成了一个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②。

这个“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市场,大规模进行投机交易或投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从根本上影响了全球经济环境。那些拥有巨额资金的退休基金、集体投资基金,如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s)和“互助基金”(Mutual Funds)等基金,在全球金融投机和证券交易中举足轻重,牟取暴利。如索罗斯一人,便可以动用 100 亿美元搞垮一个国家的货币(如英镑,一役赚了近 20 亿美元!),或在世界一个地区造成金融和经济灾难(亚洲金融危机)。一些国家多年发展经营的积累,可以被一两条金融大鳄轻易榨干、卷走。当今世界资本生钱(金融投机、证券交易)远超过劳动、实物生产创利,尽得“全球化”之利。

另一个真正全球化的现实,是跨国公司经营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得益于上述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市场,所谓“资本的自由流动”,两者本是紧密相连。跨国公司的经营,不能不说是西方垄断资本的一项绝妙发明:将工厂企业设到最低成本的国家(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有关国家的优惠政策等),然后将产品直接在当地销售(避过关税),或通过其子公司内部网络销往别国,获取最大值的利润。

当今世界的跨国公司为何物?它们首先在本国市场,常常依靠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积聚雄厚的实力,然后以资本、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全球范围设立子公司或营业点,寻求最廉价的原料、初级产品和劳动力,向全球市场推销其产品。当今世界的贸易,2/3 是被 5 万余家跨国公司所控制,其中一半以上的业务是在同一跨国公司属下不同的子公司之间完成。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 1/3 的生产和 70% 的对外直

① 房宁等:《全球化阴影之下的中国之路》,292 页。

② 见本书,第 116 页。